

人，

岁 月，

生 活

第四部

伊里亚·爱伦堡著

人、岁月、生活

第四部

爱伦堡著

冯南江 秦顺新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人、岁月、生活（第四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印刷厂印刷

字数 219,000 开本 73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frac{1}{2}$

1979年4月北京新1版 197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书号 10019·2767 定价 1.15 元

1

一九三三年我認識了美国电影导演刘易士·迈尔斯頓，而且不久就和他成为摯友。这是一个很胖、很善良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便从比薩拉比亚到美国去寻找幸福；他受过穷，挨过餓，当过苦力、店員、流浪摄影师，最后成为一个电影导演。影片《西綫无战事》給他带来了声誉和金錢，但他依然那么朴实、愉快，或者像巴別尔可能会說的那样，依然那么乐天。他喜爱一切俄罗斯的东西，沒有忘記有鮮明特色的南方話，每逢有人給他一杯酒和一条青魚，他总是很高兴。他来苏联呆了几个礼拜以后，立刻同我們的导演交上了朋友，他說：“我不是什么刘易士·迈尔斯頓，我是基希涅夫的辽尼亚·米尔什坦①……”

有一次他告訴我說，当美国决定参战的时候，曾問过許多軍人，問他們是願到欧洲去呢还是願留在美国，編制了两份名单。迈尔斯頓是想上前綫去的，但只有那些想

① 基希涅夫是苏联摩尔达維亚共和国首都，迈尔斯頓原是在基希涅夫出生的犹太人。

留在家里的人被派到前线去了。迈尔斯頓笑着补充了一句：“一般說来，生活中往往如此……”他是一个愉快的悲观主义者：“在好莱坞不能干你想干的事。但也許不仅在好莱坞是如此……”

他决定根据我过去写的长篇小说《尼古拉·庫尔包夫的生与死》拍一部影片。我劝他別拍，我不喜欢这部旧作，而且在一九三三年表现一个在新經濟政策时期的自发势力面前心惊胆战的浪漫的共产党员也頗为可笑。迈尔斯頓却定要我把电影剧本写出来，他建議把情节改动一下，描写建設、五年計划：“讓美国人看看俄国人的能耐……”

我很怀疑自己的能力，我不是剧作家，未必能写出一个优秀的电影剧本，况且我觉得用几本书拼凑起来的東西也太不像样。但我喜欢迈尔斯頓，于是同意和他一起来試試。

他邀我到英国的一个小小的疗养城市去，他在那里从事一件艰苦的工作，使自己消瘦。他体重一百公斤，每年絕食三个礼拜，減輕二十公斤，不用說，事后則狼吞虎咽，不久体重又复原了。为了絕食，他挑了一个附設着蹺脚餐厅的舒适的旅館，以免对那些照旧享用午餐和晚餐的人們过于眼紅。

他躺着，身体逐漸瘦了下去，而我却坐在旁边，吃着沒有滋味的食品，写着电影剧本。迈尔斯頓对場面的

協調有令人惊叹的敏感：“这里需要中断……也許下过雨了？或者是一个拿着小筐子的老太婆正从家里出来？……”

我没有把这个电影剧本保存下来；我現在对它的印象已經很模糊了；它仿佛是一个好萊塢和革命的杂种，是迈尔斯頓的个别的神来之笔和电影八股的一个混合物，是一出用两个成年人的諷刺点綴起来的传奇剧。

我們写滿了厚厚的一本。迈尔斯頓瘦了，衣服穿在身上显得十分寬松，末了我們便动身去巴黎。迈尔斯頓在蒙帕尔納斯認識了画家納坦·阿尔特曼，便請他繪制布景和服装的設計图。

迈尔斯頓的悲观主义原来是有根据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老板柯恩在讀了电影剧本后說：“社会問題太多，性的描写太少。現在不是把錢乱扔的时候……”

不用說，迈尔斯頓很不愉快；他为此事化了将近一年的時間，經他力爭，終於使“哥伦比亚”公司把稿費付給了阿尔特曼和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我曾在巴黎看見迈尔斯頓。他没有变瘦，但变得忧郁了。战争期間，他在好萊塢拍了一部关于苏联人的影片；他想尽力帮助我們。我到了美国以后，曾和他通过電話，他邀我去好萊塢，但我却到南方去了。我不知道他在战后的这些年里做了些什么，也不知道他有多少次被迫去干他不願干的事。）

我和阿尔特曼都为这笔意外之财而眉开眼笑。当时的报纸登满了关于在一次国家举办的抽奖中各赢了五百万法郎的两个幸运儿的故事，一个是煤矿工，另一个是面包师。尽管我们发的财寒酸得无法跟他们相比，但我们还是把自己称作煤矿工和面包师。我们决定闊闊气气地迎接一九三四年。

在埃科尔—德—梅台辛大街上有一家波兰餐厅，由于想吃俄国菜，我们常去光顾。主人殷勤好客，那几年频频发生的波苏冲突也没有对点心或炸包子的质量发生什么影响。波兰人在元旦的前夜关上自己餐厅的大门，来到了科坦登大街。我们一共有两个房间，所以便把房门洞开，把从餐厅里运来的十来张桌子排成一行。阿尔特曼在入口处写了一行醒目的艺术字：“煤矿工和面包师欢迎你们”。

现在我从旧照片上看见，当时我长得很胖，但是我并未变成一个像迈尔斯顿那样温厚的人，恰巧相反，我急欲奔赴战场，向风车和某些完全真实的磨坊主进行冲击，刺伤奸细们和保罗·瓦勒里，猛烈攻击超现实主义和上一世纪俄国的写生画，挑逗一些人，而且几乎每天都要写各种抨击性的文章，往《消息报》寄发战地通讯——总而言之，我的行径与其说像一个稳重的四十二岁的散文作家，不如说更像一个年轻的诗人。

我当时觉得，欧洲在一九三三年沉到了底，而现在则

漂到表面上来了。在新年的前几天，报上有消息說，萊比錫的法官們不得不宣告季米特洛夫无罪。这是希特勒向社会輿論投降。我常常遇見德国侨民，他們說，法西斯制度的崩潰是指日可待的——这是他們的希望，也是我的希望，我認为，一九三四年对于希特勒将是注定灭亡的一年。

希特勒党徒的残忍和残暴引起了毫不妥协的精神和复仇的渴望。我还記得，匈牙利第一屆革命政府首脑卡洛尔伯爵，一个罕見的好人，曾在“克洛賽利·德·利亚”咖啡館里对我說：“你可知道，我現在盼望什么？一个美好的夏天早晨。我走上凉台。喝着咖啡。每一棵树上都吊着一个法西斯分子……”我一面听，一面笑了。

我記得巴黎最早的反法西斯群众大会中的一次，朗之万教授、安德烈·紀德、瓦揚—古久里、馬尔罗发表了演說。安德烈·紀德就像易卜生写的那个牧师，他在講道——他証明只有共产主义能战胜邪恶，他不停地喝水，眼鏡的鏡片閃閃发光。坐在大厅里的工人从来沒讀过他的書，但知道他們面前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当紀德說“我怀着希望注視着莫斯科”的时候，他們都愉快地議論起来。馬尔罗的演說艰涩难懂；他的臉不时显露出神經質的抽搐；突然他停住了，举起一个拳头叫道：“如果战争爆发，我們去参加紅軍。”这时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所有这一切現在看来都很奇怪。人也和时代一同变

化，而且是按照不同方式变化的。在一个人死了的时候，我們对他那五光十色的、有时是互相矛盾的岁月間的关系看得比較清楚，而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今天就把昨天遮掩住了。

保罗·艾呂雅在一九三三年是超现实主义的一个坚定的信徒；当时未必有誰会預見到，反法西斯的游擊隊員們將反复吟咏他的詩篇。朗之万有一次曾忧虑地微笑着說，約里奧—居里不了解法西斯主义的全部危险性。

安德烈·馬尔罗現在是戴高乐政府的一名部长。而在那八年里，我在巴黎和西班牙經常遇見他，他是我亲密的朋友。有些回忆录的作者总喜欢中伤自己过去的朋友，这不合我的胃口。我已預先告訴讀者，在談到活人的时候，我要稍加节制，并对許多事情避而不談。但不提馬尔罗，我就无法談三十年代的事了。

他的长篇小说《人类生存的条件》于一九三三年問世；关于它我曾写道：“对历史的研究不仅用一批雕塑物丰富了馬尔罗；它还把任何一种黄金时代业已过去并已注定要灭亡的文化所具有的那种复杂性、那种必然的深度、那种极其复杂微妙的矛盾塞进了他的意識里。”但是，我曾目睹馬尔罗走向生机盎然的生活，而当一群极端保守的作家授予他龔古尔奖金时我也感到高兴；局势在評奖委员会里起作用了——法兰西向左轉了。

馬尔罗給我介紹了許多年輕作家——卡苏，阿維林，

达比。我和他的一个追随者吉烏交了朋友；一两年后他的《黑血》一書問世，这是在两次大战間写成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他是布里塔尼的圣布里厄市的教师，一点不像巴黎的文学家，他朴实、謙遜，沒有非高談一番哲理不可的願望，或者像法国人所說，非把一根头发劈成四片才肯罢休。（不久前我在羅馬意外地遇見了吉烏；我們滿怀柔情地回忆起了那遙远的岁月。）

我也常常遇見一些德国作家；我結識了溫和而又調皮的布萊希特。他談到死亡，談到梅耶尔霍尔德的演出，談到一些有趣的瑣事。过去的水手图烈克很有把握地對我說，希特勒不出一年就要被扔进施普累河；我很喜欢他的乐观主义，便送給他一只烟斗。多来尔陷入了情网，他很絕望，既拟剧本的写作提綱，又拟解放德国的計劃；看来，他有許多美妙的打算，而这些打算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我一下子就对安娜·西格斯发生了好感，她任性，很活泼，眼睛近視，但非常敏銳，虽然漫不經心，但对每一句脫口而出的話都理解得很透彻。

我們常常見面、爭論、預測未来。有的人发誓說，法西斯主义不久即將在德国崩潰，另一些人却断定褐色的鼠疫将波及法国。

不过顏色变了，法国的鼠疫是天蓝色的。我看見過“法兰西團結党”的几次示威游行；穿着蓝衬衣的年輕的法西斯分子操練着步法，举手向自己的元首致敬。“战斗

十字团”、“爱国青年团”的呼吁書开始出现。与德国不同的是在法西斯分子中間工人很少，于是我带着冷笑打量着这些发誓要消灭所有共产党员的娇生惯养的子弟。

我打算春天回莫斯科。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定于夏季召开。我像第一次去参加舞会的姑娘那么激动；所有的作家都将欢聚一堂，并将开始一場关于艺术的坦率而严肃的談話；这准是一桩大事……

我在一九三三年讀了《被开垦的处女地》、巴格里茨基新写的几篇长詩、帕斯捷尔納克的《通行許可証》、巴别尔的新的短篇小說、謝里文斯基的詩。我覺得我們的文学正在蒸蒸日上。

許多法国作家在一九三三年怀着希望轉向共产党人；这大概是由于千百万人在讀到法西斯分子焚毀書籍、死刑、暴行时所产生的恐怖和憤怒。在革命作家联合会的呼吁書上签名的人中間还有日奥諾和德利耶·里亚·罗歇尔。

我是在二十年代末認識日奥諾的；他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脸上經常挂着平靜的笑容，写作一些关于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說。他在一九三三年和別的許多作家一同詛咒法西斯主义。后来我很久沒有見到他，当我讀了他的一篇主张順从希特勒的文章后，我大为惊奇。而在他后来順从了占領制度时，我对此已不感到惊奇了。

德利耶·里亚·罗歇尔比他出色得多——才思横溢、

有其独特的真诚，但患了很危险的精神病。我們曾一同在反法西斯的知識分子經常聚會的文化大廈發言和友好地交談。我在一次旅行結束後回到巴黎時，在聖日爾林蔭道上的咖啡館門口看見了德利耶。他急忙轉過臉去。有人給了我一本他新近寫的書，書中有一段奇怪的自白：“我們將同所有的人作戰。這就是法西斯主義……自由完蛋了。人應該陷入自己黑暗的深淵。這是我，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永遠熱愛自由的人現在說的話……”他迷上了法西斯主義，當希特勒黨徒占領法國的時候，他曾和他們合作，而當他發現自己的打算失敗了以後，就於一九四四年自殺了。

天才的短文作家，布里塔尼人，工人的兒子海因諾常來出席我們的集會。我保存了他贈給我的《一個四十歲的人的日記》一書，現在我把這本書打開了：“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東方出現了一片巨大的火光。它的反光正在幫助我們生活……我們沒有效法他們的榜樣。戰鬥沒有展開去。現在我們看見，那場大火的火星如何在西方的泥潭里閃耀和隱沒。但這場戰鬥、這個榜樣却依然幾乎是我們的全部希望、我們的全部喜悅……”現在海因諾所想的却是另一回事了。但是一首歌詞是不能刪去一個字的。可以撕去歷史課本中的一頁，但歷史却不能重寫……

法國的法西斯分子在一九三三年末抬頭了。巴黎宛

如一个被騷扰了的养蜂場，充滿了一片嗡嗡之声。人們在咖啡館里、在地下电車的車廂里、在街道的角落里爭論得声嘶力竭。家庭正在分裂。这在某一点上类似一九一七年夏天的莫斯科。

就連蒙帕尔納斯的艺术家們也开始对政治发生了兴趣。

我生平第一次迷上了无綫电收音机的匣子。

康·亚·費定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自己在科坦登街上我的住宅里度过的一晚，在那天晚上，馬尔罗曾向他詳細打听苏联的情况，康斯坦丁·亚历山大洛維奇还同列昂哈尔德·弗兰克爭論了一番。我們常在“庫波尔”咖啡館或我家里爭論問題。

我有时遇見安德烈·沙姆逊，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南方人，为人溫和，心腸也好，但在談話中却指責所有对法西斯主义抱怀疑态度的人，他自称为“雅各宾党人”。現在他是科学院院士；每隔五年或十年，我們就会見一次面，并且心平气和地回忆着往事。

常到“庫波尔”咖啡館去的有謝·鮑·契林諾夫、艾丽莎·尤里耶芙娜、阿拉貢、杰斯諾斯、罗日·瓦揚、雷耐·克萊維尔以及其他一些过去的和現在的超現實主义者。雷耐·克萊維尔有一双善良的、好似受到迫害的人的眼睛；他为共产党人和超現實主义者之間的不和感到十分痛苦。我企图安慰他，但并未奏效。

周刊《展望》和《讀書》的出版者，激烈的沃热尔有时候邀請我到他的菲桑杰利的領地去。他是一个假紳士，但这不是就綱領而言，而是就天性而言——他本人并未觉察到这一点。他贊美苏联，和阿·阿·伊格那切夫一同去过莫斯科，邀請共产党员前去見他，但当他的女儿瑪丽一克洛特嫁給瓦揚一古久里以后，他却有些惘然若失了。在菲桑杰利經常进行无休止的爭論，沃热尔喊得比誰都凶，他在生活中溫柔敦厚，但发起議論来却激烈异常。

毋庸諱言，我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高兴；与悲觀的預言相反，《第二天》在莫斯科出版了。也許，这件事在我对各种事件的評價上发生过一定的影响？我一生中常常看到，私人的事务、工作中的成就或失敗以至健康状况，往往都会对人的見解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不管怎样，我滿怀信心地瞻望着未来。

十二月末，我收到从莫斯科拍来的一封电报，“我已与鮑里斯·拉宾結婚，姓氏与通訊处同前，祝新年快乐，伊琳娜”。我認識鮑·馬·拉宾是在一年之前；他既爱書籍，又爱艰辛而危險的猎奇，这是不常見的，我因此很喜欢他，我也喜欢他的書。稍后我还要談到他——当我们一起住在拉甫魯辛斯基胡同的住宅里的时候，我对他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但电报却使我吃了一惊：伊琳娜在給我的信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拉宾。我觉得电报中关于姓氏和

通訊处的說明很滑稽——这里既表现了伊琳娜的性格，也显示了时代的性格。

我們为伊琳娜的幸福干杯。除夕过得相当令人滿意，这不仅因为波兰厨师为我們做了一頓丰美的午餐，而且还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客人很多）都兴致勃勃，我們乐了一个通宵。

我当时四十二岁，岁数已不算小了，但显然还很年輕。我相信法西斯主义的垮台指日可待，相信正义的胜利、艺术的繁荣。我觉得过去的几年是一个过于漫长的前夜，于是就給由我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間所写的文章汇集而成的一本書取名为《姗姗来迟的結局》。我沒有說什么来表白自己——我贊同过許多人的幻想，而且怎么也不能想像，我已漸入老年，却看不見結局。

2

我同伊·阿·伊里夫和叶·彼·彼得罗夫是一九三二年在莫斯科相識的，但一年后他們到了巴黎我才和他們成为好友。当时，我們作家去国外旅行总要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事。伊里夫和彼得罗夫乘苏联軍艦到了意大利，本想乘原軍艦回来，不料却跑到維也納去了，他們希望在那里得到《十二把椅子》的譯本的稿費。他們从譯者手中

好不容易地弄到一点錢之后，便动身到巴黎去了。

我認識一位原籍俄国的女士。她在一个影片公司工作，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我設法使她相信，写喜剧脚本的本領誰也比不上伊里夫和彼得罗夫，于是他們就得，到了一笔預支的款子。

当然，我立刻便把煤矿工和面包师中彩的故事告訴了他們。他們每天問我：“关于我們的百万富翁报上有什么新聞嗎？”当談到电影剧本的时候，彼得罗夫便說：“故事的开头有了，一个穷人中彩得了五百万……”

他們在旅館里辛勤地写作，而晚上便去“庫波尔”咖啡館。我們在那里設想着各种各样滑稽的情节；除了剧本的两位作者之外，参加寻找“題材”的还有沙維奇、画家阿尔特曼、波兰建筑师謝尼奧尔和我。

剧本并不成功；无论伊里夫和彼得罗夫怎样努力，剧本还是表明作者不很了解法国的生活。但目的已經达到，他們在巴黎住了一段时期。而我也有所收获：認識了两个极好的人。

在回忆录中，两个名字常常合写成“伊里夫彼得罗夫”。但他們彼此并不相像。伊里亚·阿尔諾尔多維奇腴腆、沉默，很少开玩笑，但却很尖刻，而且，他和許多引得千万人发笑的作家——从果戈理到左琴科——一样，也是很忧郁的。他在巴黎找到了早就离开敖德薩的弟弟。弟弟是画家，他对伊里夫大談其現代艺术的形形色色。

伊里夫喜欢心灵的混乱和破产。彼得罗夫却喜欢舒适；他很容易和各式各样的人混熟；常在各种会议上代表自己和伊里夫发言；他能一连几小时地逗人发笑，自己也跟着笑。这是一个少见的好人；他希望人们生活得更好，他看到了一切能使人们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的事物。他大概是我所遇到的最乐观的人：他愿一切都比实际情况更好些。他在谈到一名噪一时的流氓时说：“也许事实并非如此？别去理会人们的流言蜚语……”在希特勒进攻我国半年以前，彼得罗夫被派往德国。回来后他安慰我们说：“德国人极端厌恶战争……”

伊里夫和彼得罗夫并非形影不离，但他们共同写作，共同在世界上游荡，相处得很亲密。他们似乎是互相取长补短，伊里夫的尖刻讽刺对彼得罗夫的幽默是一种很好的调料。

尽管伊里夫比较沉默，但不知怎的却比彼得罗夫更引人注目；我真正了解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却晚得多，那是在战争时期。

我常想起苏联的讽刺作家左琴科、柯尔卓夫、艾尔德曼的命运。伊里夫和彼得罗夫却一直很走运。读者读了他们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后就立刻爱上了他们。他们的敌对者很少，也很少受到“严厉批评”。他们在国外呆过，游遍了美国；关于这次旅行，他们写了一本有趣而又富于见地的书——他们善于观察生活。他们写这部有关美国的